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

Edited by André Lefevere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p.com



预订请拨 95105711 或短信发送至 106695887808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三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

Edited by André Lefevere

夏平 导读

讀者不喜空頭，希望對西方公私論述有所了解。貢獻而枝外，
圖說也一并提出，使讀者可更易了解。

（原刊於《文匯報》2001年5月19日）

外 教社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讀書本向伊，聽回聲聽聲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 / (英)勒菲弗尔(Lefevere, A.)编; 夏平导读。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1777-2

I. ①翻… II. ①勒… ②夏… III. ①翻译—研究—文集—英文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5327 号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ISBN 978-0415076975

Copyright © 1992 by Routledge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aylor & Francis Books Ltd. 2 & 4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Abingdon, OX14 4RN, UK.

Licensed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booksellers found selling this title outside the Mainland of China will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本书由泰勒·弗朗西斯出版社授权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仅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图字: 09—2009—470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tlfp.com.cn

网 址: http://www.stlfp.com.cn http://www.sflfp.com

责任编辑: 孙 静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字数 29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777-2 / H · 0772

定 价: 19.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翻译研究》出版说明

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有关翻译研究的丛书也出了多套。不过,长期以来,国内引进的原版翻译著作匮乏,不少研究都是根据二手资料;另外,学习翻译专业的研究生人数越来越多,这种状况若继续存在,将十分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翻译人才的培养。鉴于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约请了多名国内翻译研究著名学者分别开列出最值得引进的国外翻译研究论著的书目,并对这些书目进行整理、排序,最终确定了准备引进的正式书单。该丛书涉及的论著时间跨度大,既有经典,也有新论;内容的覆盖面也相当广泛,既有翻译本体的研究,也有跨学科的研究。这套丛书的引进将会满足翻译专业研究生教学原版参考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需要。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谨以此丛书献给我国的翻译学界。

林国聚
薛其波
耿立林
萧宗朝
文仲英
翁瑞珉
平 钦
郭南翔
苏美娟
董智林
凌林海
哎懿良
黎忠黄
罗林黄
甘 黄
彭 高
章善明
陈文林
王文琴
李桂琴
朱伟琴
张玉梅
林玉春
吕国勤
胡振清
高 希
王 恒
许静

“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季羡林 王宗炎 刘重德
副主任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申丹 吕俊 刘靖之 许 钧 庄智象 李文俊
汪榕培 金圣华 金 隅 林戊荪 罗新璋 罗选民
杨自俭 张 今 张柏然 郭建中 程镇球 谭载喜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克非 王 宁 王宏印 王东风 方梦之 毛荣贵
刘士聪 刘树森 刘和平 刘宓庆 冯庆华 朱纯深
朱志瑜 孙致礼 孙艺风 孙迎春 李亚舒 汪义群
连淑能 范守义 陈宏薇 林克难 罗进德 罗国林
邱懋如 郑体武 杨晓荣 张美芳 张南峰 柯 平
柯文礼 郭著章 高 健 黄 任 黄振定 黄忠廉
崔永禄 傅勇林 辜正坤 谢天振 蔡新乐 廖七一
穆 雷

秘书 孙 玉

借鉴和创造

(代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从成立以来一直是我国外语教育最优秀的后勤部和侦调部。因为它不但为我国各个层次(尤其本科与研究生层次)的外语教育提供了多种高水平的教材、教参和工具书,而且还出版了多学科、多语种和多系列的中文版和外文版的学术著作,比如“现代语言学丛书”、“牛津应用语言学丛书”、“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外国文学史丛书”、“剑桥文学指南丛书”、“当代英语语言学丛书”以及列入国家及教育部规划的人文社科重点项目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的图书等。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教育改革的需要,还出版了一批国际金融、对外贸易、涉外保险、国际经济法、国际新闻和管理科学等方面的教材与专著。这些著作在外语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在发挥着强有力的情报、调研和指导作用。这是外语界有口皆碑的。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纵深发展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求,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近些年来在我国有了较快的发展,最突出的证据就是①外语类硕士博士点上研究对比与翻译方向的学生在逐年迅速增多,而且我们的高校已经有了翻译学院和翻译系(当然还太少)。②外语专业的学生考中文、法律等其他人文社科专业的硕士、博士以及反方向的走向已经起步。这种跨学科的人才已成为人才资源竞争的最主要对象,因此发展趋势定会看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适应这种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新学科建设的需要,不但积极出版国内关于对比研究和翻译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最近又推出了原版“国外翻译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时间跨度从古代到现代,所选书目皆为译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作用的名家名著,堪称译学经典。他们计划分批出

版,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这套丛书的出版首先可以解决国内翻译教学原版参考书多年匮乏的困难,真可以说是我国翻译教学与理论研究的及时雨。我想学习和关心这个学科的师生和其他人士定会对这套书的引进为之欢呼,为之祝贺。

这套丛书的价值还在于能大大促进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发展。译学学科的发展依赖于研究者在三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和结合。一是对本国译学的继承性研究;二是对外国译学的借鉴性研究;三是对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只有这三者研究深入并结合好了,才可能从经验与技巧逐步升华为具有科学性的译学理论。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已取得了很显著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翻译学在我国已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有了独立学科的初级形态,90 年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对学科的独立性以及理论体系的结构与功能有了更多的探讨。依照学科建设的规律和研究现状,我们尚需在上述三个方面加大研究力度,而这套丛书就是借鉴性研究的主要资源。从这个角度讲,这套丛书的引进也是我国文化基本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

在新的世纪,文化(包括各类科学技术)会多方面快速深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各国之间的交流会空前深广,因此翻译的功能会逐步扩大,实用性翻译人才的需求量定会空前增加。这就要求我们除了做好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以外,还应十分重视实用性人才的培养和应用译学的研究。我想出版社一定会关注和引导译学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的发展趋势。

杨自俭

青岛海洋大学六三居室

2001 年 3 月 28 日

导 读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1946—1996)是著名的比利时裔美国学者兼译者。他一生著述丰富,学术视野宽广,见解敏锐深邃,既有丰富的翻译实践,又有开拓性的理论成就。尽管他仅50岁就因白血病而英年早逝,但是他对于文化翻译研究的贡献已经成为翻译研究宝库中的一笔巨大财富。他的治学态度、方法和学术思想正在受到当今学人们景仰、研究和发展。

早期的翻译研究大多将注意力集中于翻译过程中一些微观层次的问题,如怎样做到译文与原文的意义对等,以及译文的归化等。勒菲弗尔却把翻译置于宏大的现实背景中,以跨学科的视角,将翻译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来加以考察,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译者身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工作,他的译文必定与这个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一些因素对于译文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决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那么简单。因此,要研究翻译,如果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讨论,远不足以反映翻译的复杂性,因为在翻译所受的诸多束缚中,来自语言的束缚相对而言倒是最不重要的。如果我们纵览文化史,审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对翻译的影响,就能对常规的翻译问题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破解,同时关注翻译研究如何更加有效促进整个文化研究的大势。因此,翻译理应在文化历史中占据比它今天更加核心的地位。

勒菲弗尔把这本书称为“资料汇编”(a sourcebook),因为它收录了自公元前106年到公元1931年之间将近2000年西欧名家有关文学翻译的论述。这些论述的原文除了英文之外,还有法文、德文、拉丁文等,它们构成了现代翻译思想的前驱和基石。这些资料根据编者的

研究视角被分为几个主题,为编者提出的翻译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支持和佐证。读者不仅可以从中窥视出编者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还可以学习到编者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同时,由于编者谙熟多种语言,博览群书,这本资料汇编中的许多论述,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的引述提供了许多方便。

在“导言”(Introduction)中,编者开宗明义,引用了17世纪法国主教P. D. Huetius对于翻译的定义,并且加以阐发。在历史上,翻译不仅被看成一种“经国大事”,而且被视为两种文化的碰撞和竞争。之所以需要翻译,就说明本文化不足,需要得到外来文化的补充。由于两种文化的差异,外来文化的进入和渗透,除了补充本文化之外,也会对本文化提出挑战,甚至颠覆本文化。所以,需要考察翻译的动机,是谁让翻译的(即赞助人是谁),翻译(译者/译文)的权威及可信性,以及译文读者的要求等。赞助人作为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人,有权决定翻译什么内容,以及对译文进行删节。赞助人限定译者的意识形态范围。批评家限定译者的诗学范围。当然,不同性质的原文应当区别对待。例如西塞罗说他曾经比较自由地将一些希腊文演讲译成拉丁文。再如,Edward Fitzgerald的《鲁拜集》译文自由到了好像是再创作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哲学家兼翻译家Schleiermacher认为,译者只能从外语译到母语,而不能从母语译到外语,否则就是母语的叛离者(deserter),联想到中文作品有许多是由中国译者而不是由外国译者翻译成外文的,中国译者也许会有自己的见解吧!

显然,本资料汇编企图影响翻译研究的方向。编者认为,翻译应当联系权力和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来进行研究。翻译还应当联系文本类型和语域来研究,以及结合将不同的语篇全域整合起来的企图进行研究。这样一来,翻译研究的领域大为开拓,远非拘泥于字斟句酌、追求译文的信达和动态对等之类的传统研究可比了。

本书的正文,是将全部资料,按照编者所认为的翻译研究的重要方面,分为七个主题排列,分别是意识形态的影响、赞助人的权力、诗学、语篇全域、翻译与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翻译技巧,以及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八章,收录了较长的论述,是前面各章的延伸和拓展。

应当指出的是,编者在本书中所使用的词语,如“赞助人”、“诗学”

等,其含义往往大于甚至异于我们平时所用的含义。“赞助人”可以是许可和资助翻译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经典的古代欧洲王公贵族或是教宗,也可以是后世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或主管部门,有时甚至包括译文的受众。“诗学”的意思则远远超出了诗歌研究的范围,延伸至艺术程式、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等领域。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第一章收录的资料反映了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对译文形成的重大影响。罗马诗人贺拉斯说,受到赞助人信任的译者无需逐字翻译,而只需译出含义即可。法国大文豪雨果则根据他那时代的现实指出,当时的国家对于译文的问世高度警惕,甚至将译文看成对于现存文化的潜在威胁、破坏,甚至颠覆。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举出了权力无理扬抑译文的荒诞实例:一个蹩脚写匠窃取了路德的《新约》译文,挂上自己的姓名出版,此人的赞助人——某王公贵族,居然在前言中下令禁止人们阅读路德所翻译的《新约》,只准阅读这个蹩脚写匠其实还是从路德那儿偷来的译文。

第二章所收录的资料进一步证明,赞助人对于翻译什么,怎样翻译以及译文是否可以出版等问题拥有至高无上的发言权,以至于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批评家兼翻译家德莱登哀叹,译者好比替别人种葡萄的奴隶,葡萄盛产是他的本分,而如果葡萄欠收他就逃不了严责;作者是他思想和语词的主人,而可怜的译者被绑在人家的思想上,拼命却往往徒劳无功地试图追趕着原文。另一方面,德国文豪歌德则指出,译者大有功于人类,他们是精神商业交易的中介人,翻译工作始终是这种商业交易中的最为重要和尊严的事业之一。他甚至引用《可兰经》中的话“真主给了每一国一位它本身语言的先知”,宣称“每一位译者是他本国人民中的先知”。

如前所述,本书中提到的“诗学”(poetics)的含义很广,涉及各个民族不同的审美和文化心理和观念。一个民族可以接受的艺术程式或表现方式,未必能为另个民族所接受或欣赏,搞得不好,甚至会引起反感,造成轩然大波。第三章所收录的资料从多方面反映出这个问题。例如,Willamowitz-Moellendorff认为,德文是无法遂译荷马史诗的。因为,从形式上看,德文缺乏史诗音步,如果用散文翻译,是绝对无法体现出荷马史诗的崇高艺术性的;而在内容方面,另一位作家兼翻译家指出,《伊利亚特》中的一些场景必须予以改写或者删节,才能

适合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或观众的欣赏习惯。但是,希腊戏剧中的对话,则可用与之相近的德国古典戏剧语言表现出来。反过来,各民族不同的审美和文化心理和习惯不是不能通过适当的方式,相互吸收容纳、取长补短的。Schlegel 就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矫正德国戏剧痼疾的一剂良好的解药。

如果说,第三章的资料与各个文化、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程式或表现方式有关,那么,第四章的资料则涉及译文的思想内容。一些译者感到,译文必须在原文和译文的两种不同的语篇全域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才不会引起读者的反感和抵制。“语篇全域”是指某一特定文化的观念、意识形态、人物和物品等。例如,17 世纪法国翻译家 Nicolas Perrot d'Ablancourt 的译文曾被谥为“美丽而不忠实”。对于此,他是有自己的见解的。在 d'Ablancourt 翻译的古希腊作家卢奇安(Lucian)的作品的前言中,他说,这些作品多次提到对于男童的爱,这种娈童之爱在古希腊屡见不鲜,但是却会吓坏法国读者。另外,卢奇安喜欢旁征博引,作品中动辄引用荷马的诗句,以及陈腐的故事、谚语、比喻等,颇有妄掉书袋之嫌,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把这些内容一股脑儿删除了。也许,今天有不少人会认为这种由译者擅自删节的做法不足为训,不过,另一位法国翻译家 Jacques Delille 的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道理。Delille 有一句名言:“翻译的极端忠实产生极端的不忠实”(Extreme faithfulness in translation results in extreme unfaithfulness)。他认为,最好的诗歌译文也只会损害原文,冲淡美感。诗歌只有让同时也是诗人的译者来作出体现原诗精髓的翻译,如蒲柏译荷马,德莱登译维吉尔,才能差强人意。

第五章阐述翻译对于语言的发展和教育所起的作用。16 世纪西班牙人文主义者 Juan Luis Vives 指出,译者在翻译时,遇到他本文化的语篇全域中所没有的语词,就必须如西塞罗所说的那样“铸造新词语”,久而久之,译者们不仅极大丰富了本文化的语汇,而且还贡献了大量新的修辞手段和资源。同时,从传统上看,翻译工作是作家们最好的学校,而一代又一代的欧洲儿童也正是借助译文来学习外国语的。翻译的重要作用,于此可见一斑。多少世纪来,关于翻译技巧的讨论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迄今对于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达成共识。第六章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古人对于这

方面的见解。著名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对于西塞罗比较自由的译文有不同的看法，表示他自己的译文宁肯失于过分谨慎也不愿失于过分放纵不羁。另一些译者，如诗人蒲柏、罗塞蒂、阿诺德等则谈论他们自己的翻译体会。17世纪法国翻译家 Antoine Lemaistre 总结出 10 条“法语翻译规则”，却被本书编者讥为“书呆子气”，“可怜无补费精神”？

第七章“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论述被认为体现某种文化的核心价值的经典作品的翻译问题。这类“中心文本”包括基督教的《圣经》，各民族的史诗，如荷马史诗和《尼伯龙根之歌》等。它们的译文必须极为仔细地审校，因为“无法接受的”译文很可能被视为对于该文化的基础的颠覆。然而，这种恭敬、严谨的态度只是用来对待所谓“中心文化”的中心文本的。当中心文化的译者翻译他认为某种外围（原文是“peripheral”）的文化所产生的文本的时候，其译文的自由度是非常大的，例如前面提到的 Edward Fitzgerald 翻译的波斯诗人的《鲁拜集》。本书编者认为，在处理在一种文化中起着中心作用的文本，以及在一种中心文化翻译它认为无关紧要的文化所产生的文本的时候，诸如意识形态、诗学和语篇全域等因素的重要性，就再也显明不过地表露出来了。

在最后一章，即第八章中，对前面七章里所讨论的问题都有进一步深入的论述。这一章所收录的较长的论述，还拓展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广度。编者要想表达的是，翻译的研究如果仅仅限于翻译技巧，是不会有多大的成果的。有成果的文学翻译研究只能是社会—历史性质的。最重要的考虑不是字面上文字的对应，而是为何以这种方式对应，是哪些社会、文学、意识形态的考虑使得译者们这样翻译的，他们这样翻译希望达到什么成就，是不是可以认为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以及为何会这样的。

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内容丰富，编者青灯黄卷，搜罗剔抉，其功不小。我们在使用这本资料汇编的同时，可以瞥见编者的丰富学术成就除了来自他的超人才华以外，更来自他辛勤的汗水。相比起来，有些好作空谈而论证贫乏或陈腐，游谈无根、凌空蹈虚的“学者”，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夏 平

2010年1月

Two things can be held against me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translation: one concerns the selection of the work, the other the way in which I have translated it. One group of people will say that I should not have translated this particular author, another group that I should not have translated him in this way.

Nicolas Perrot d'Ablancourt

Preface

This collection contains what many consider to b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 at least most seminal texts produced over centuries of thinking about translation in Western Europe in Latin, French, German, and English. The collection spans approximately the twenty centuries that elapsed between the birth, in 106 BC, of the Roman orator, statesman, and translator Marcus Tullius Cicero and the death, in 1931 AD, of the German classical scholar and translator Ulrich von Willamowitz-Moellendorff. No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include modern or contemporary texts. These should, and will, be gathered in other collections to be published in the series for which the present collection endeavors to establish a modest genealogy.

A fair number of the texts collected here have been much referred to, infrequently quoted, and even more rarely read since they have not all previously been available in English. I have translated anew all the texts printed here, except for those originally written in English, and I have tried to select texts that should provide the essential background for current thinki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ture.

Not all texts collected here have by any means been translated or printed in their entirety. To do so would have necessitated the production of a book several times the size of this one. Moreover, a fair number of well-known texts on translation tend, on closer inspection, to say relatively little about translation while touching on a wide variety of other topics. I have, accordingly, limited myself to those extracts which bear directly on translation, as in Luther's famous *Letter*, for example, where I have excluded the (great majority of) passages dealing with all kinds of disputes between the German rulers of his time.

The texts have been arranged thematically, rather than chronologically.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translations are made under a number of constraints of which language is arguably the least important. I have therefore arranged the shorter texts according to the constraint they seem to address most obviously. Some texts deal with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on the production of translations, with the power of patronage to enforce these constraints, with constraints of a more poetical nature, with so-called Universe of Discourse constraints and, finally, with both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h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attempt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languages in spite of these constraints. Other texts raise the question of the position of a central text in a culture and of a central culture in a configuration of cultures. Still other texts deal with the role translation has traditionally played in education. A final category of texts deals mainly with the technique of actual translating, usually in the form of lists of rul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rangement will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topics that should be covered in any discuss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ore effectively than any chronological arrangement could have done, even though the texts have been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sections, for reasons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Needless to say, I found myself pleasantly surprised and more than a little envious to discover the constraints I thought I had identified and elevated to the status of organizational categories neatly set out in Madame Dacier's introduction to her translation of the *Iliad*. This illuminating text therefore occupies the position of a "second introduction" to the present collection.

Both my surprise and my envy are symptomatic of current thinking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uch of what we are saying has been said already, albeit in a different kind of jargon. This should not deter us, however. Looking back at the long tradition of thinking on translation in Western Europe, we realize that relatively recent attempts to limit discussions of translation to what pertains to constraints of language only, signally fail to do justic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Furthermore, knowledge of the tradition, the genealogy of our thinking, helps us to focus not just on problems concerning translation as such, but also on ways in which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an be made productive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general. We are finally beginning to realize that translation deserves to occupy a much more central position in cultural history than the one to which it is currently relegated.

Acknowledgment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 gratitude and great appreciation to Mr Roger Tavernier, chief bibliographer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in Leuven, Flanders, without whose help 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gain access to some of the texts translated here, and most especially to my colleague and friend Dr Judith Woodsworth of Concordia University, Montreal, who has worked miracles proofreading the manuscript.

Contents

Preface	xii
Acknowledgments	xiii
Introduction	1
Anne Dacier: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her translation of the <i>Iliad</i>	10
1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the shaping of a translation	14
Flaccus Quintus Horatius: from the "Letter to the Pisones," also known as the <i>Ars Poetica</i>	15
Aurelius Augustinus (Saint Augustine): from "On the Christian Doctrine"; from the "Letter to Saint Jerome"	15
Martin Luther: from the "Circular Letter on Translation"	16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from the "History of Romantic Literature"	17
Anne Louise Germaine de Staël: from the <i>Writings</i>	17
Victor Hugo: from the preface to the New Shakespeare Translation	18
2 The power of patronage	19
John of Trevisa: from the "Dialogue between a Lord and a Clerk upon Translation," printed as the preface to his translation of the <i>Polychronicon</i>	20
Jean de Brèche, called de Tours: from the preface to his translation of Hippocrates	21